

不确定性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 理论变革与实践转向

文 军 刘雨航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但在新发展阶段,各类不确定性因素大量滋生,渗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环境、主体、方式、过程以及结果等层面,致使中国式现代化面临“不确定性”的诸多挑战。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既是以往现代化历程的直接后果,也将作为新的社会现实成为当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变量。但当前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仍以“确定性”思维为主导,不仅传统的现代化理论知识难以解释不断变动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在实践层面上难以应对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现象。对此,亟须以“不确定性”挑战为当代观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革和实践转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不确定性;理论变革;实践转向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3.01.003

一、问题的提出:不确定性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场世界性变革,但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程看,西方国家率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中国现代化曾长期在西方话语体系之下展开。虽然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艾利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提出的现代化10条标准^①,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但这种具有直线性、简单性、趋同化特征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模式以及标准,难以有效解释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便致力于开辟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此打破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②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其应对方式研究”(2021BSH002);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不确定性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及其体系建构”(22ASH00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挑战及其应对机制研究”(22&ZD183),同时该研究得到了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的大力支持。

作者简介:文军,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上海 200062; jwen@soci.ecnu.edu.cn);刘雨航,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62; 545001422@qq.com)。

^①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现代化的10条标准:(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2)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12%—15%;(3)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4)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70%以上;(5)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人数占10%—15%;(6)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7)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在1000人以下;(8)平均预期寿命70岁以上;(9)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10)识字人口占80%以上。

^② 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本土实践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客观而言,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局面下,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遭遇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风险挑战与发展机遇高度交织,标志着全球不确定性背景正在成为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底色和关键变量。尤其是2020年以来,突发的新冠疫情快速席卷全球并不断暴发,长期潜在却不断累积的不确定性因素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人类舞台^①。从最新发布的全​​球“不确定性指数”(world uncertainty index)来看,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水平自2012年起开始快速攀升,并于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期间达到历史最高点,过去10年所观察到的不确定性水平超过了过去发展60年的总和。全球反复的新冠疫情作为导火索,还引发了世界制度设计、经济秩序与文化规则的连锁效应,使得各国社会整体的不确定性指数倍增,全球的不确定性水平在未来10年将会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攀升。正如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强调的,“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②。无论是实务部门还是理论家们都开始对全球现代化中的“不确定性”予以高度关注。

不确定性自全球现代化进程开启之日起便与流动性、个体化一同交融到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当中,并随着现代化转型的推进而陆续延展^③。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不确定性作为现代性的后果,“其影响也存在于现代性的内部”,将作为新的社会事实影响着现代化的未来走向,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④。在当代全球现代化语境中,不确定性被赋予多重意涵,既指代本体论层面事物发展的变动状态,也在认识论层面指代主体对事物发展的一种未知或未完全知晓的状态,还在方法论层面指代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行动范式与价值理念,主张“动中取动”,在不确定性中认识和把握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因素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中的风险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却又与传统风险在存在属性、现实作用以及治理路径等方面区别开来,不仅呈现出了不同于传统风险的内生性、随机性、个体化以及全面化特征,在发展后果上也是风险与机遇并存^⑤,既需要对不确定性中的发展风险予以预测预防和纾解调控,以此维持常态的社会秩序、整合和运行,也需要积极引导不确定性向发展机遇和活力转化。

全球不确定性背景对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渗透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事实。但从理论层面来看,传统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从一种“确定性”的视角和“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将现代化视作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演进过程,并从结构、主体、行为、过程、功能等视角展开解读,不确定性则被视作社会发展的“偶然因素”和“概率事件”,缺乏本体性层面的探究。从实践层面来看,人们更加关注现代化进程

① Ahir H., Bloom N., Furceri D., “60 Years of Uncertainty”,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20/03/pdf/imf-launches-world-uncertainty-index-wui-furceri.pdf>, 访问日期:2022年10月17日。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人民日报》2022年4月30日,第1版。

③ 流动性、个体化以及不确定性等都可以视作现代性的一种具体表达,在已有研究中,人们习惯于用诸如从“总体性社会”(totalitarian society)向“个体化社会”(individualized society)、从“固态社会”(solid society)到“流动社会”(liquid society)等形态的转变来描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整体性特征,而随着不确定性社会的全面到来,从“确定性社会”(certain society)到“不确定性社会”(uncertain society)的转变将成为现代化转型的又一整体性表达。

④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20年,第115—117页。

⑤ “风险”与“不确定性”存在至少以下三方面的区分:(1)从性质来看,“风险”常常与具体的地点和事件联系在一起,它是一种可量度和可计算的不确定性,往往与概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用“客观”概率和“主观”概率来分别指称“风险”和“不确定性”。(2)从结果来看,“风险”往往指向的是一种负面的不利结果,而“不确定性”指向的既可能是负面的不利结果,也可能是正面的有利结果,可以说不确定性发展是“风险”与“机遇”的并存。(3)一般而言,“风险”是可治理的,而“不确定性”本质上却无法治理。除非是运用特定的技术、程序以及设施将“不确定性”降维至可预期的“风险”,才可以随之展开相应的行动。实际上,随着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全面增长,社会风险开始从外部环境中的客观风险向内部自生的主观风险转变,传统风险形态也开始向新型的不确定性风险演变。参见文军、刘雨婷:《不确定性社会的“风险”及其治理困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中的各类风险事件,并将其作为外在于人的认知客体和行动对象加以评估、防范和应对,尽可能地将风险的负面影响控制到较低水平,其结果常常是以牺牲社会活力为代价来维持常态的社会秩序和发展。然而,随着不确定性的全面增长,这种低限度的社会整合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从当前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来看,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大难度在于当人们开始普遍意识到不确定性的结构性作用时,新冠疫情、自然灾害等事件背后不确定性因素的涌现与蔓延却具有突发性,留给人们的反应时间和操作空间都极为有限,短时间难以从长期以来“确定性”思维主导的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中抽身,不仅新型不确定性应对机制的建构严重滞后,对不确定性与现代化本身的内在联结也缺乏足够认知。能否突破“确定性”桎梏,正确认识、理解和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在抵御社会风险的同时,抓住伴随而来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活力,是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转型的深化,人们对发展不确定性的关注程度不断加深,关注领域不断拓展,构建能观照“不确定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实践机制越来越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既面临全球不确定性的巨大冲击,中国特色的发展实践也正在催生大量内部自生的不确定性因素。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相互交织,使得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较之全球社会更加凸显和特殊,也远比想象中更加复杂多变。各类不确定性因素将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得以具象化,从一种普遍性的唯名式概括衍变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社会现实,并将引发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实践和话语体系中加以分析理解。鉴于此,我们将以“不确定性”挑战为观照,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本土实践中推进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革和实践转向,推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

二、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确定性”挑战

在全球不确定性背景下,应对“不确定性”挑战的前提条件,是洞悉不确定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情境中对不确定性加以本体性层面的考评。实际上,不确定性正在演变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情境性问题,即不确定性已经全面渗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场域之中,不仅包括空间层面的静态情境,也包括时间变化的动态情境,成为中国社会在超地方时空政策、制度、文化、关系以及主体行动等因素在互动中所形成的独特性^①。这决定着对中国式现代化“不确定性”挑战的理解必须将共时性视角与历时性视角相结合。从共时性视角来说,不确定性因素不仅存在于现代化环境之中,同样存在于现代化主体及现代化方式本身;从历时性视角来说,不确定性既渗透在现代化过程之中,也体现在现代化结果层面。鉴于此,我们将整合上述共时性视角和历时性视角,采用“环境—主体—方式—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当代中国式现代化正面临的“不确定性”挑战展开剖析。

(一)中国式现代化环境的不确定性

以工业化、信息化以及数字化为特征的技术变革,推动着中国社会在短时间里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形态转变。这在提高人们不确定性应对能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技术使用后果的不确定性不仅大量存在于人化环境之中,还以法律制度、管理规范、组织机构、教育体系、科学知识生产等更加多样化的形式运转^②,高度渗透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之中。技术变革致使外部环境中风险与不确定性的释放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③,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环境中充斥着人为制造的技术风险和不可预期的复杂变化,并演化成为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尤其是随着信息

① 吕洁琼、文军:《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社区为本的情境实践及其反思——基于甘肃 K 县的考察》,《西北民族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② Ellul J.,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and Random House, 1964.

③ 乌尔希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年,第 2、4、24、25 页。

时代、数字时代的降临,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天生所具有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开始向整个社会传递和蔓延,甚至直接推动着不确定性成为新阶段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①。

不确定性风险生产与传播正在成为全球化的主导逻辑,风险全球化抑或不确定性全球化成为现代文明的真实写照^②。在全球不确定性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早已超出传统社会地方实践的范畴,而成为一种基于脱域机制的超地方性全球实践。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将在全球社会的百年大变局中实现,这在迎来崭新发展机遇的同时,国际局势波诡云谲,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核战争风险、气候灾害、网络攻击、经济危机等层出不穷的全球安全问题和新兴风险,导致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环境一开始就陷入了长期的波动性、复杂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状态。正如党中央自2020年以来所反复强调的,当前全球疫情仍处高位,疫情的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说,当代中国式现代化首要面对的便是国内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二)中国式现代化主体的不确定性

中国社会正在历经的现代化转型重新塑造着中国民众的生存状态,作为现代化主体的“人”的不确定性程度空前高涨。随着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场域的专门化加剧,人们开始从传统社会的整合性角色重叠转向现代社会的多元角色分化,活动场域开始从封闭性的地方情境走向脱域情境中的复合场域^③。现代人需要在日益多元的身份角色和形式多样的活动场域之间开展自己的社会生活,“现代性以强制且必要的自决权取代了社会身份的确定性”,人们从传统社会的确定性范畴中获得主体性解放^④。现代性渗透在日益多元的角色分化和社会生活之中,导致传统社会相对稳定的意义体系在消退^⑤,“相对性意识成了覆盖面宽广的事实……不确定性主宰了现代人的意识”^⑥。尤其是上一阶段的中国现代化转型^⑦主要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为驱动,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物质—制度—技术”等外在性因素层面,中国现代化建设工业化、经济增长等方面获得重大进步的同时,主体的认识水平、发展能力却难以跟上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主体认知和心理情感的不确定性随之大量衍生,并将作用于主体行为之上。各种不确定性行为不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呈现,这种“知行关系”的改变也致使人们相对确定性行动基础的衰弱甚至是丧失,将长期处于不确定性的生存境遇^⑧。

① 刘少杰:《不确定条件下社会信任的分化与协调》,《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② 乌尔希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第27—35页。

③ 在传统社会,许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和资源分配场域是重叠在一起的,如经济人角色、利他者角色、情感人角色的重叠或交叉,传统的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同时还是情感单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社会角色开始产生分化,角色扮演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同的角色类型被分置到不同的资源分配场域。从理想类型的角度看,人们分别在市场分配场域(市场部门)、制度性(或政策性)资源分配场域(国家公共部门)、利他性资源分配场域(第三部门)和情感性资源分配场域(关系部门)中扮演自利人(经济人)角色、公民角色、利他者(道义人)角色和情感人(或关系人)角色。参见王宁:《角色扮演、场域切换与第三次分配——兼论分享经济作为广义第三次分配》,《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④ 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第181—182页。

⑤ Berger P.L.,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Anchor, 1990, pp.25-27.

⑥ Brague R., *The Kingdom of Man: Genesis and Failure of the Modern Project*,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8.

⑦ 上一阶段主要是指从改革开放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的这段时期。这一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经济发展为主导,旨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则更加侧重于为经济转型服务,旨在通过法治化、制度化等方式维持社会稳定,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而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社会发展步入新阶段,将实现从经济单一发展指标向经济综合发展指标的转变,从经济发展目标向“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目标转变,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向发展质量转变。

⑧ 这种“知行关系”在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看来是实现“确定性寻求”的关键,可以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即通过对所处情境中不确定性因素的主观认知,为自我行动提供相对确定性的行动指南。但现代化转型打破了传统社会“自成一体”的知识体系和“知行合一”的行动逻辑,主体的认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短时间内难以跟上现代化转型所带来的复杂变化,无法为自身提供相对确定性的行动基础。参见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8—190页。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陌生化以及流动性趋势也在客观上改变着传统社会的社会关系和信任机制。社会关系在走向脱域的同时变得愈发不确定,难以继续为个体提供确定性的社会基础和可持久的人际交往^①。“无意识中关于人类整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感受,但人们不同程度地从共同体的庇护中脱离,需要以个体的方式面对发展环境中纷呈复杂的不确定性,丧失了长久以来的确定性基础和本体性安全,加剧了个体的不安全感、焦虑和恐惧^②。其结果不仅是人们面对不确定性时指向自我的信心受到影响,陌生人之间由于缺乏关于彼此态度、价值观和特征的信息,而不具备建立特殊信任的基础,新型的普遍信任机制却又尚未健全。但信任作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为我们提供了行动的基础,使我们只考虑未来的部分可能性而非无限可能性”^③,广泛发生的信任危机削弱了人们的不确定性应对能力。

(三)中国式现代化方式的不确定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确定性还源自现代化方式本身,人们越来越难以驾驭“现代性的猛兽”^④。其中,人类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持续创新作为现代化的核心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用以减少不确定性的工具^⑤,但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各种新知识、新技术不断产生并嵌入到社会中去^⑥,传统的真理被不断颠覆,“不确定性”几乎是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规律,知识与科技同样具备不确定性的属性。这种知识与科技的不确定性首先来源于知识与科技自身,人类知识与科学技术的本质生命在于更新和变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与科技更新速率使其处于一种不断创新的不确定性之中。此外,这种知识与科技的不确定性还根源于人类认识能力和认知水平的有限性,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并未留给我们足够的时空条件去预测复杂情境中技术应用的实践后果。尤其是正在发生的数字变革,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以数字劳动为核心的新就业形态迅速壮大、数字生活高度普及^⑦,使得数字技术基于其匿名性、流动性和脱域性特征而具有的高度不确定性全面渗透到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⑧。

现代化是一个复合式的系统性进程,但随着知识生产的专门化和脱域程度的加深,专家系统贯穿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内部分化正在发生。专家系统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脱域(disembedding)机制以及知识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实践部门和学者都习惯于在特定领域内展开行动。这在推进社会分工专门化的同时,难以避免地造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各个社会系统之间的分化。而社会治理则成为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整合机制,需要通过治理机制维持现代化进程中各个被专家系统所支配的社会系统之间的整合。但强调风险控制的技术治理是当前国家治理的主导逻辑^⑨,这种技术治理模式虽然能够通过制度刚性维持着各个社会系统之间的基本整合,但却无法有效应对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只能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环境和主体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掩盖在制度所建构起的“安全区”之下,治理实践中暂时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累积,“二次风险”随时可能发生,寻求确定性的治理机制反而会导致更多不确定性的再生产。

① 随着个体化社会和流动社会的到来,不仅血/亲缘、地缘关系正在从稳定走向松散,业缘关系受到数字经济繁荣、非正式就业兴起等因素的影响更是充满不确定性。

②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谷蕾、武媛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2、115—117页。

③ 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④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33页。

⑤ “确定性”实际上是人类用理性思维抽象出来的一种模型推演,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简化。因此,科学技术在很多情况下之所以能量化处理,就是因为它能将“不确定性”通过抽象的量化和各种演算模型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从而达到对事物及其演变的“确定性”寻求。

⑥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34页。

⑦ 文军、刘雨婷:《新就业形态的不确定性:平台资本空间中的数字劳动及其反思》,《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⑧ 刘雨婷、文军:《“数字”作为“劳动”的前缀: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困境》,《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1期。

⑨ 黄晓春、嵇欣:《技术治理的极限及其超越》,《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四)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的不确定性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压缩饼干式”的并联性特征^①,其时间维度上的压缩性与空间上的延展性并存,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和均衡性,必要时会采取重点突破的策略。这也造成了以往现代化历程难以避免地带着“粗放式”色彩,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不仅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不同步的情况长期存在,城乡差距^②、区域差异^③也仍然显著。此外,从经济产业来看,虽然改革开放后第二、三产业发展迅速,但产业结构不合理、内生能力较弱、技术水平较低等问题仍然存在。从居民收入来看,虽然人均 GDP 不断上涨,2021 年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 GDP 已达 8.1 万元^④,但贫富差距仍然显著。从居民受教育水平来看,虽然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近 20 年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⑤,但也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区域差异。

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不均衡发展所引发的发展能力与发展方式、发展水平错位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直接导致各类不确定性因素的大量产生,还造成了中国社会内部不确定性应对能力上的分化。但不确定性的增长却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处于一种不确定性增长的系统性与不确定性应对能力不均衡性并存的复杂境况。在不确定性的全面冲击之下,不仅现代化过程中主体所作出的实践反应难以确定,其行动后果也难以预测。不确定性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的整体特征,但同时又呈现出复杂分化的实践表征。不确定性始终是指向未来的^⑥,这种主体行动的不确定性会再度通过“脱域”机制向其他区域、其他主体蔓延。不均衡发展所导致的任何潜在“薄弱环节”都有可能成为不确定性深入其中的突破口,继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乃至“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⑦。

(五) 中国式现代化结果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作为事物发展的客观属性,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便始终存在,但其集中显现并演变成为一种普遍特征却是新近之事。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传统乡土社会中,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自然界,基于自然界的规律性而形成的各种知识技术、实践经验能够为人们提供长久的支撑,足以应付发展情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人们养成了基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传统”的力量构成了维持乡土社会日常秩序的“确定性”基础,社会生活基本处于人们的掌控之中,社会发展的结果基本是可以预测到的。但全球发展的蔓延催生了全新的社会事实,各种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现象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早已超出了人们搭建的“可能性隧道”(tunnel of possibilities)^⑧。由此看来,不确定性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马克思、吉登斯等社会学家笔下“现代性的断裂”(discontinuities)的独特视角。现代化的绝对速度、变迁范围以及持续再生的不确定性,使得基于传统之确定性的行动模

①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串联式”发展过程不同,中国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参见尉建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人民日报》2022年5月16日,第9版。

② 虽然经过脱贫攻坚的伟大斗争,我国农村发展迅速,但城乡发展差距仍然存在。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0%。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

③ 《2021年中国经济年报》显示,2021年全国GDP总量1143670亿元,比2020年增长8.1%,但地区差异仍显著。其中,东部地区生产总值592202亿元,占全国比重为51.78%,超出中、西以及东北地区总和。

④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

⑤ 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占18—22岁适龄人口的比例)达54.4%,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8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达到13.8年。参见教育部:《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教育报》2021年8月28日,第3版。

⑥ Jansen T., et 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Uncertain Risk’. A Qualitative Study among Different Societal Groups”,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19, 22(5), pp.1-14.

⑦ 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Edward N. Lorenz)提出了“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蝴蝶效应”说明了任何事物发展均存在定数与变数,既有规律可循,也存在不可测的“变数”,再微小的“不确定性”也有可能影响到事物整体发展。

⑧ 文军、王云龙:《新发展社会学理论构建中的不确定性发展逻辑及其启示》,《社会发展研究》2022年第1期。

式日渐崩溃……“生活中即将走出的每一步都是对未来可能性做出的反应”^①。在当代中国,不仅民众对自我生活的掌控力不断下降,很难再具有传统社会一眼便可望到头的“直线人生”,现代社会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脱离了延续数千年的“故事主线”(story line)^②。

现代化结果的不确定性不仅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走向和后果将不断超出我们的预测范围,而且其再生产属性也必将引起个体生产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发展形态的根本性变革。在现代性的断裂之中,以及“传统”与“未来”之间的当下,我们长期以来所依仗和推崇的则是“工具理性”的祛魅。但当下持续再生的不确定性显然也超出、起码是暂时超出了韦伯所指向的以“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为核心的现代化范畴,强调计算能力的理性主义显然只能部分地解释而不再能够支配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③,以及传统“确定性”范式和理性化趋势所主导的现代化模式正在面临的本体性危机。

三、面向不确定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变革

当前,“不确定性”挑战也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镜鉴,能够以此窥探传统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知识局限。从知识对象上来看,传统现代化理论虽然对不确定性现象予以了有限关注,但其理论视域主要集中在“外在风险”维度,主要探究现代化发展环境中的不确定性风险,而未辩证看待不确定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作用以及不确定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从研究取向上来看,传统现代化理论体系整体上仍以“确定性”范式为主导,更加倾向于将现代化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看作社会发展进程中需要加以克服的障碍因素,并且倾向于在特定领域、特定对象或特定事件的范畴内,探究不确定性的应对策略。从研究结果来看,相比于“风险”,传统现代化理论对不确定性缺乏正式的理论关注^④。从上述维度不难看出,传统现代化理论不仅预设了“西方中心”的知识体系和实践路径,而且整体上仍是以“确定性”取向为主导的。而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背景下,传统现代化理论自身的解释力以及实践意义都严重受限。对此,亟须“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以当代中国的“不确定性”挑战为观照,从以下方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变革。

一是从“西方话语”转向全球视野中的“本土经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产生于特定历史文化情境的西方现代化理论难以详尽解释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所遭遇的诸多新现象、新问题,尤其是其中大量滋生的各类不确定性因素。充满特殊性和差异性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也提供了生动的本土经验和丰富的理论土壤,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提供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⑤。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提升“理论自觉”,自内而外地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而非照搬西方现代化理论由外而内地“套用”在中国实践之上,是新发展阶段摆脱西方话语体系掣肘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保证。但“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降临,中国式现代化无法脱离世界体系而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既要立足本土,也要放眼世界,既要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又要走出西方话语体系,更要与西方现代化理论展开对话,积极推动中国经验走向世界。一言蔽之,我们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建构需要在开放性的全球体系和不确定性的“宏大叙事”中,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⑥,探求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

①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第112页。

②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4—5页。

③ 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④ 以中国知网(www.cnki.net)收录的文章为例,截至2022年11月10日,检索主题词“现代化”和“不确定性”,仅查询到论文361篇,其中60篇发表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上,如果以“现代化”和“风险”为主题词来进行检索,收录的论文有7691篇,其中CSSCI期刊论文1024篇。

⑤ 尉建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人民日报》2022年5月16日,第9版。

⑥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求是》2022年第10期。

二是从“结构叙事”转向“主体叙事”“关系叙事”。古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巨大而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是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和根本性的转变^①。这种在现代化理论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叙事”,主要采取“确定性”的研究范式,是对社会发展共性特征的一种追述与概括。但随着传统社会相对“确定性”的社会结构加速瓦解,面对日益纷呈复杂的现代化过程,从操作性层面而言,虽然仍可以使用诸如信息化、数字化等“宏大叙事”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趋势加以概括,但现实情境中的现代化实践过程不仅具有强烈的情境性特征,脱域性机制又赋予其无限的延展性,“结构叙事”背后的类型化认知方式也不利于我们察觉真实世界中的主体性。如果过度追求社会整体层面的“结构叙事”难免会过于“形而上”,从而陷入本质主义的陷阱。虽然对中国式现代化结构转型连续谱系的解读与叙事仍然必要,但“人”作为现代化进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应对主体,其自身无论是个体认知、行为的不确定性还是群体层面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也空前之高。基于人民主体性、能动性而展开的“主体叙事”和“关系叙事”将成为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关键。越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大潮和全球风云中,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取向,通过人民的主体认知和实践行动去理解和应对“不确定性”的时代挑战。

三是从学科化的“散点叙事”转向跨学科的“整合叙事”。现代化主体以及现代化方式内部自生的不确定性,使得不确定性成为铭刻在现代化上的“先天基因”。但在系统生产的不确定性面前,不仅现代化方式自身的内部分化日趋扩大,现代化理论体系中的理论张力也日益凸显。“现代化”本该是一个跨学科甚至去学科边界的议题,但在传统现代化理论中,不同学科习惯于在各自的学科边界内,截取现代化的部分脉络或某个侧面加以探究。最浅显的例子是,经济学更加关注现代化中的经济转型、政治学更加关注政治转型,而社会学则更加关注其中的社会转型,但实际上经济转型、政治转型、社会转型以及其他维度的转型之间高度关联甚至本为一体。这种学科化研究范式的“人为切割”,在推动现代化理论日益专门化的同时,也导致了传统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散点化”,从而难以有效解释高度复杂的现代化进程和系统生成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就“中国式现代化”议题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真问题”“真需求”为导向,搭建跨学科的交流平台,推动建构能与当前不确定性发展相匹配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和整合框架。

四是从发展路径的“事实”取向转向“事实”与“规范”取向并重。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更加偏重“事实取向”,即倾向于对以往现代化历程和正在遭遇的现实问题提供理论阐述。在不确定性背景下,“事实取向”的滞后性使得现代化理论研究与现代化发展实践之间的脱节愈发明显。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应当推动“事实取向”与“规范取向”的结合,不仅要遵循“实然”的逻辑对以往的实践经验和当下的社会现实展开学理分析,同样需要遵循“应然”的逻辑探寻中国式现代化在不确定性情境中的未来道路。更为必要的是,将“实然”与“应然”的逻辑相结合,只有以历史为鉴、以实践为本,才能更好地在不确定性情境中探求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方向。其中,尤其需要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中层理论建构,强化事实取向与规范取向的合流以及“社会诊断”与“社会行动”的联结,并通过对社会科学介入方法(method of social science intervention)的探寻来实现社会科学研究与政治行动之间的贯通,来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议题^②。回到“不确定性”议题,“行动取向”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并非要完全预测不确定性的未来结果,而是希望中层理论的建构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对话,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行为、集体行动乃至社会发展提供可参考的行动指南,以此简化不确定性情境中的复杂性。

五是从研究范式的“确定性取向”转向“不确定性取向”。随着现代化转型的深入,流动将取代固定、轻灵将取代沉重、不确定性将取代确定性,演变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特征。以确定性范式为主导的传统现代化理论体系对不确定性发展的解释力不断下降,人们对学者所提出的“社会诊断”

① 李培林:《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现代化新征程》,《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2期。

② 吴越菲、文军:《回到“好社会”:重建“需要为本”的规范社会学传统》,《学术月刊》2022年第2期。

和相关政策日渐感到厌倦和失望^①。当前,亟须打破“确定性”的桎梏,树立新型的“不确定性”思维和价值关怀,要勇敢且主动地迎接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确定性”挑战。此外,还需要加强不确定性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创新,在整合定量与定性两大研究体系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层面的交流、借鉴与合作,例如将经济学的“概率论”与社会学模型相结合^②。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需要加强网络研究方法在不确定性研究中的创新应用。总体而言,需要推动传统的“确定性”研究范式向“不确定性”研究范式转变,建构以“不确定性”为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此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全面增长的不确定性提供理论解释,践行“在不确定性中认识和把握不确定性”的时代使命。

四、不确定性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转向

中国式现代化正在遭遇全方位的“不确定性”挑战,但传统的“确定性思维”和“风险思维”仍然长期主导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道路。以当前持续进行的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为例,虽然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防疫措施,但整体上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防控型”补救色彩,时常陷入被新冠疫情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在新冠疫情这块“试金石”之下,不难看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实践仍存在很多“短板”,例如中国社会发展的内生发展能力稍显不足,“人”的现代化并不足以与“物”的现代化相匹配,刚性治理体制的治理效能有待提升以及现代化进程的不均衡性仍然显著等。对此,亟须以“不确定性”为导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转型。

一是在全球化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道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命题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③,不确定性超出传统社会的地方范畴成为全球社会发展的世界性问题,全球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又会渗透到中国式现代化动态的时空情境中。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本土社会始终是不确定性的应对主体,增强中国社会在开放性全球社会中的内生发展能力,是应对当代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不确定性”挑战的根本所在。就此而言,需要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动新发展格局建构的同时,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美丽中国建设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突破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普遍规则^④。通过加强培育技术主导型产业,优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定位,增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打破西方长期以来的“技术封锁”与“技术垄断”,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但技术创新也势必带来一系列新的不确定性连锁反应,这是对不确定性情境中的中国本土社会内生发展能力的深层考验。这需要以中国的制度优势为保障,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同时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辐射,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向更具整合性的内生发展道路^⑤,以内部的相对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⑥。

二是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追求和最终归宿,在物质文明比较繁荣的新发展阶段,“人”的主体性地位反而弥足珍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加强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投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并推动民众价值

① Crook S.,“Change, Uncertainty and the Future of Sociology”,*Journal of Sociology*,2003,39(1), pp.7-14.

② Small M.L. and Pager D.,“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Racial Discrimin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20,34(2), pp.49-67.

③ Robertson R. and White K.E.,“What is Globalization?”,In Ritzer G.(Ed.),*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Globaliz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ress,2007, p.62.

④ 李培林:《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⑤ 文军、刘雨航:《迈向不确定性时代:乡村振兴中的内生发展困境及其应对》,《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⑥ 习近平:《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求是》2022年第7期。

理念、心理情感、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关系模式等系列转变。此外,不确定性应对能力也成为“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范畴和衡量标准,不仅需要行动层面、心理层面的主体赋能,提升人们在“被围困的不确定性社会”中生存的各类技能,还需要从群体层面创造数字时代的新型联结,通过集体行动共同应对不确定性。简言之,需要通过主体性的挖掘和培育,推动现代社会不确定性情境中“行动者的归来”。在此意义上,“人”的现代化注定是充满个性和差异性的过程,其要义在于行动主体不仅具有在普遍性制度、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寻求确定性的生存能力,同样具有在高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情境中再生产自身社会生活 and 自我实现的能力,成为社会情境的生产者、行动者,而非消费者^①。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回归“人之本真”,以此实现与“物”的现代化相匹配的“人”的现代化。

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统筹协调作用。就当前刚性治理模式的实践限度而言,亟须在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和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将韧性视角引入治理领域^②,以韧性治理方式应对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③。而韧性治理方式的建构,则要从制度层面入手,调和制度刚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内在张力,促进常态治理体制与应急治理体制之间的衔接。面对伴随中国社会发展而客观发生的一系列主体利益分化,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心理情感和实践行动反应,当代中国的社会团结和整合难以通过制度刚性实现。还应当树立“需求为本”的现代国家治理导向,形塑自下而上的治理逻辑和民众参与^④,通过“需求”导向^⑤的韧性治理,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韧性治理方式的优势还在于能够通过制度刚性和治理韧性的嵌合,在为个体行动和社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留有足够的能动空间,通过制度优势为主体、社会赋能,并以此实现从治理韧性到主体韧性、社会韧性的拓展。一个高韧性的社会,是适应现代性不断深化过程中的高不确定性,并保持活力与秩序统一的关键^⑥。

四是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均衡性、系统性。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不确定性并不会顾及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但这种不均衡发展将直接影响到特定地区、特定领域抑或特定群体的不确定性应对能力。在努力实现第一个奋斗目标期间,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相对落后,为了追赶西方国家发展水平,主要以发展速度为主,例如在经济发展上便主张“先富带后富”。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中国整体发展水平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应当坚持“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目标,从发展水平向发展质量转变,以此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和均衡性。虽然现代化进程不可能齐步走,但却可以在重点突破与全面发展、非均衡与均衡的持续转换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循环上升,但也需要重点兼顾客观存在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群体差距等,补齐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这也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更为重要的是,在系统生成的不确定性面前,需要考虑到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主体在不确定性应对能力上的均衡性,提高中国社会在不确定性情境中的整体生存和发展能力。

五是树立能应对不确定性的现代化理念。不确定性正在演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特征和存在属性,只有承认这个基本事实,并树立新型的不确定性理念,才能在动态的不确定性情境中高质量

① 阿兰·图海纳:《行动者的归来》,苏国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2—23页。

② 刘志敏、叶超:《社会—生态韧性视角下城乡治理的逻辑框架》,《地理科学进展》2021年第1期。

③ Chelleri L., Waters J.J., Olazabal M., et al. “Resilience Trade-offs: Addressing Multiple Scales and Temporal Aspects of Urban Resilience”, *Environment & Urbanization*, 2015, 27(1), pp.181-198.

④ 吴越菲、文军:《回到“好社会”:重建“需要为本”的规范社会学传统》,《学术月刊》2022年第2期。

⑤ “需求”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主体利益”,韧性治理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建构利益主体的联结通道,在调和个体利益二重性以及化解利益主体之间竞争冲突的基础上,促成现代公民的主体参与和行动整合,以此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参见刘拥华:《社会治理与通道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⑥ 任远:《后疫情时代的社会韧性建设》,《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体而言,不确定性理念的树立首先需要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态度认识、理解和接纳中国式现代化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以及内部自生的不确定性属性。在此基础上,辩证看待不确定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作用,不仅需要对其潜在的风险因子保持警惕,更关键的是需要发掘长期以来被“风险思维”所掩盖的不确定性中的发展机遇与发展活力,在抵御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社会风险的同时激发社会活力。最为深层的是,当不确定性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发展新常态,那么对单一确定性的追求,则成为一种需要克服的天性,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将成为影响主体行动选择的关键变量,如何与之共生,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行动逻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放弃确定性的寻求,社会发展行动逻辑所具有的相对确定性始终有迹可循,但需要改变固守单一“确定性”的传统做法和执着,以一种不确定性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确定性情境中寻求甚至是创造新的确定性。

五、总结与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确定性寻求”

新冠疫情的全球反复标志着不确定性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登场,但客观而言,当前的现代化模式在不确定性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应对上相对薄弱,亟待以当代中国的“不确定性”挑战为观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革和实践转向。就理论层面而言,需要从“西方话语”转向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经验”,从“结构叙事”转向“主体叙事”和“关系叙事”,从学科化的“碎片叙事”转向跨学科的“整合叙事”,从发展路径的“事实”取向转向“事实”与“规范”取向并重,从研究范式的“确定性取向”转向“不确定性取向”,推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就实践层面而言,同样需要以不确定性为导向,在全球化背景中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性、均衡性和系统性,并积极推动“人”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犹如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所说,原本对现代性议题进行定位、规避的“确定性”观念不仅被一系列全球风险事实所否定,同时也传达出了“世界事务的不确定、中心的缺失以及控制台的缺失”。^① 简而言之,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增长,我们需要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革新和实践转向,提升中国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应对能力,以在全球不确定性情境中推进中国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如今,一个在鲍曼眼中“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控的年代”业已降临,但“确定性的寻求”^②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人类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在寻求确定性和产生新的不确定性之间循环往复的螺旋上升过程。伴随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③,不仅要防止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④的发生,也要抓住不确定性中伴随风险而来的发展活力和发展机遇。甚至风险与机遇之间天然便是同一的,风险的应对过程同样也是实现发展的过程,而谋求发展的同时也必将承担潜在的风险,完全躲避或者控制风险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在错失发展机遇和压制发展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发展的风险和机遇共生关系,共同构成或者说共同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挑战。不确定性的全面增长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还体现在,现代化转型推动人类社会步入“加速时代”,不仅社会生活、社会流动、社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确定性—不确定性”的更替速率同样如此。并且两者之间还呈现出高度相关性,不断加速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过程,一方面导致了不确定性因素的

①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43页。

② 德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打破了古典哲学中绝对确定性的形而上学幻想,承认了不确定性的永恒存在,但也为“确定性的寻求”留有了空间。他认为虽然绝对确定性只存在于思辨的精神世界,但可以通过从不确定性情境到确定性情境的转换来寻求相对的确定性。参见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第1—18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④ “黑天鹅”一般指那些出乎意料发生的小概率风险事件;“灰犀牛”指那些经常被提示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大概率风险事件。

持续生产,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应对层出不穷的不确定性和寻求新的确定性中实现。这种社会转型发展速度以及“确定性—不确定性”更替速率的加快,实际上也构成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重要分野。

可预期的是,即使身处不确定性社会,确定性的寻求仍将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仍将是不断遭遇新的不确定性并不断寻求新的确定性的过程。但“确定性—不确定性”的更替速率的不断加快,也导致“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形态发生改变。现代社会所寻求的确定性不再似传统社会时那么轻易和恒定,确定性本身也变得愈发不确定和灵活多变,我们对确定性及其寻求方式都需要进行再理解和再建构。如果说传统社会中的“确定性”指代一种固定的、恒久的“最终解决”,那么现代社会中的“确定性”只是一种“暂时的安排”^①,其本身也具有“不确定性”的属性,只是处于变化的节奏较为缓和的“相对确定”状态。形象地说,现代化转型中“确定性的寻求”不再指向伫立在深海岿然不动的“定海神针”,而是悬挂在摩天大楼之中的“阻尼器”,需要通过自身的适度振动化解整幢大楼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而维持着楼宇的安稳和社会的正常运行。如何从“定海神针”向“阻尼器”转变,进而更好地迎接不确定性社会的到来,正是新发展阶段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这注定是一段布满荆棘的漫长前路,因此,我们更要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对自身行动的信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挑战中共同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Theoretical Changes and Practical Turns 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ncertainty

Wen Jun Liu Yuhang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P.R.China;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P.R.China)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achieve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owever,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various uncertainties have emerged, permeating the environment, subjects, methods, processes and result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is makes contemporar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ace many challenges of “uncertainty”. Uncertainty is both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past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new social reality that will become a key variabl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ut the current explo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ath is still dominated by the “certainty” mindset. Not only is it difficult for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modernization to explain the ever-changing uncertainties, but al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the endless uncertaintie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In this regar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take the challenge of “uncertainty” as a contemporary reference, and to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Uncertainty; Theoretical Changes; Practical turn

[责任编辑:陆 影]

①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6、12页。